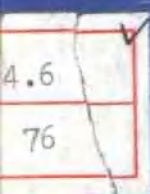


冶金工业经济蓝皮书

冶金工业——

1994 年分析与 1995 年预测

冶金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F 424.6
L 76

工业经济蓝皮书编撰人员

问:殷瑞钰

编:刘勇昌

副主编:白葆华 王炳根 周国成 熊志军 李裕荣

编:刘静海 王继祥 周正良 郝玉峰

目 录

一. 宏观经济篇

- 1、199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 中国社科院与国家统计局“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1)
- 2、1994年国家财政形势分析与1995年预测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贾康(11)
- 3、1994年我国投资形势分析和1995年预测
.....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张汉亚(15)
- 4、1994年金融形势分析及1995年预测
..... 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姜维俊(20)
- 5、1994年价格走势分析与1995年预测
..... 中国价格信息中心:陈俊(25)
- 6、1994年改革形势分析与1995年改革展望
..... 国家体改委综合司:胡德巧(30)
- 7、1994年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概况与1995年展望
..... 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李维城(34)

二. 相关行业篇

8. 1994年铁路运输情况分析 with 1995年预测
..... 铁道部计划司:林绍礼(39)
9. 煤炭工业 1994年回顾与 1995年展望
..... 煤炭工业部:贺定超(43)
10. 电力工业 1994年情况分析和 1995年趋势展望
.....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郑源春(48)
11. 1994年油品市场情况分析 with 1995年预测
..... 中国石化总公司办公厅调研室(52)
12. 1995年机械工业经济形势展望
..... 机械工业部政策法规体改司:杨桦 田淑坤(55)
13. 1994年化工生产情况分析 with 1995年展望
..... 化工部政策研究室:刘欢(60)
14. 1994~1995年我国运输业发展预测
..... 国家信息中心(63)

三. 钢铁行业篇

15. 1994年全国钢铁生产回顾和 1995年预测

- 部经研中心:薛征鸿(66)
16. 1994 年钢材市场供求分析与 1995 年预测
..... 部生产协调司(78)
17. 1994 年冶金矿山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 矿山办:吴力忠(83)
18. 1994 年钢铁工业 经济效益情况分析
..... 部经济调节司:贾晓芳(84)
19. 1994 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与 1995 年预测
..... 部发展规划司:刘芳(86)
20. 1994 年物资形势分析及 1995 年物资形势展望
..... 国内贸易部信息中心:陈克新(88)
21. 1994 年冶金工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 部体改法规司:贺赤兵(93)
22. 近期国际钢材市场分析与预测
..... 部信息研究院:金 琳(99)

四、典型企业篇

23. 宝钢 1994 年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with 1995 年预测
..... 宝钢:程陆平(106)
24. 首钢 1994 年经营生产情况分析
..... 首钢总公司 (110)
25. 邯钢 1994 年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with 1995 年预测
..... 邯钢 李华甫、秦海、徐银聚(114)
26.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1994 年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with 1995 年预测
..... 杭钢:张雪根(122)

五、统计篇〈快报〉

1995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1994 年,在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遵循“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基础上,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年初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同时宏观调控继续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国民经济的多数指标正在向着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接近。另一方面,在改革与发展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也显得十分突出,特别是物价上涨过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根本治理,必将对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1994 年的成绩和问题双突出的局面,一方面为我们 1995 年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增大了我们继续改革、促进发展各方面工作的难度。当前,正确地总结 1994 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在 1995 年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科学的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做好 1995 年的经济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要经济指标预测结果

1994、1995 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1. 总量及产业指标	1994 年	1995 年
GDP 增长率	11.5%	10.5%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3.0%	3.5%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16.0%	14.0%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10.2%	10.5%
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投资	15500 亿元	19000 亿元
增长率	31.4%	22.6%
实际增长率	18.3%	11.5%
3. 价格		
全国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率	19.5%	13.0%
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率	21.0%	15.0%
投资品价格上涨率	11.0%	10.0%
4. 居民收入与消费		
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	7.0%	6.5%
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	5.0%	5.5%
城镇居民总消费实际增长率	8.0%	8.5%
农村居民总消费实际增长率	6.0%	7.5%

社会消费实际增长率	14.0%	12.0%
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名义增长率	26.1%	20.0%
实际增长率	5.5%	6.5%
6. 财政		
财政收入（不含债务）	5220 亿元	6120 亿元
增长率	18.0%	17.0%
财政支出	6394 亿元	7495 亿元
增长率	19.2%	17.2%
软赤字	1174 亿元	1375 亿元
7. 金融		
新增居民（农村+城镇）存款	5000 亿元	5350 亿元
增长率	38.9%	30.0%
新增贷款	5500 亿元	6500 亿元
8. 对外贸易		
进出口总量	2350 亿美元	2760 亿美元
增长率	20.3%	17.5%

二、1994 年经济总体形势分析

1994 年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 1994 年初以来，相继出台了财税、金融、外经外贸、投资、价格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并初步取得较好效果。这些措施已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首先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我们在党的十四大上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而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战略框架，这是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得以出台的根本保证。其次，以自 1993 年中提出并开始落实执行的 16 条措施为标志的宏观调控，初步遏制了自 1993 年上半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而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四高两乱”的不正常现象（高投资、高货币投放、高物价、高进口，和金融秩序混乱、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这样，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不仅成为了 16 条措施实施的合理的必然的继续，而且 16 条措施的实施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也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环境。

外汇外贸、财税、金融改革措施出台后所产生的某些短期的负面影响比我们预想的小，实际效果比我们预期的要好。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对外币的比价基本稳定，人民币币值不仅没有出现狂泄，而且稳中有升；进出口逆差缩小，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的较为平稳顺利，上半年国内财政收入以及工商税收都较上半年有明确增加；金融继续保持平稳运行，不仅有效地控制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有效地控制了全社会的信用总量，而且保证了结构调整与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可以说，今年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确实加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势头，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宏观调控的多数指标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突出表现在宏观调控过程没有引起经

济运行的大起大落，使过热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降温，不仅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较快的水平，而且宏观经济环境有了明显改善，金融、外汇、财政、物资四大平衡一致趋向好转。1994 年上半年，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 11.6%，虽然仍属高速增长，但比上年同期的增长率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25.2%，增长幅度回落了近 36 个百分点，投资规模过度膨胀的趋势已得到一定遏制。

这些宏观调控措施之所以较以前历次调控更为成功，主要是因为：这次宏观调控实施的时机比 1988 年那次掌握得及时；在调控手段上特别注意了以金融调控为突破口，注意了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时强调经济及法律手段的运用。此外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顶住了来自因国有企业困难而要求放松调控强度和为短期内遏制“过热”而要求采取更严厉的调控措施两方面压力，宏观调控力度掌握得比较得当，取得了既控制了“过热”，又保证了重点发展的需要这样较为理想的效果。此外，我们能够积极地从以往的宏观调控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及改革深入所提供的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从去年开始的此次宏观调控为今年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了条件，二者形成了积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宏观调控所取得积极成果不仅使经济“软着陆”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使我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为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奠定了基础。

由于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取得较好效果，宏观调控继续取得成效，同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又显得十分突出，因此，1994 年的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 经济增长速度平稳回落，但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1994 年 GDP 增长整速度将为 11.8% 左右，使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国家之一。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分别为 3.0%、16.0% 和 10.2% 左右。

(2) 投资膨胀有所遏制，投资增幅仍较强劲。1994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超过 15000 亿元，比 1993 年实际增长 18% 以上，仍将快于 GDP 的实际增长速度，因此投资增长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长速度较上年有明显回落，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上升，但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过小不容乐观。

(3) 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商品零售增幅较小。1994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差距有所减小，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低于城镇居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 25%，但实际增长幅度较小，大幅度低于经济增长。

(4) 金融形势平稳，财政不容乐观。银行居民储蓄增幅较大，新增存款和新增贷款差距不大。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软）赤字规模偏大。

(5) 对外贸易形势好转，进出口差额缩小。1994 年进出口总量预计为 2350 亿美元，其中进口 1200 亿美元，出口 1150 亿美元。

(6)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明显回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形势严峻。1994 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上年有较大回落，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上升过猛，通货膨胀问题显得十分突出。

我们在 1993 年的秋季报告中曾分析了 1994 年“软着陆”的几种可能性。现在看起来，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投资规模控制等方面已趋向实现“软着陆”的第一种结果，但是在物价这个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还存在着出现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的第三种结果的危险。

三、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通货膨胀问题、投资规模

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农业问题，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角度各有不同，但不仅国内经济界的大多数人，而且国外大多数实事求是的评论意见都认为这五个问题属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急需解决又难彻底解决的基本问题之列。在目前来看，最紧迫的问题是通货膨胀问题，而通货膨胀问题又是与其它四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投资规模、国有企业、农业，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集中反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一关系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因此，通过深化改革，争取较好地解决这四个问题，将成为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我们应该看到，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我国又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这一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这必然对价格形成机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必须区分结构性价格调整所带来的物价上涨和由于体制障碍或经济运行管理不当而造成的由总需求膨胀引起的通货膨胀。前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本，后者则是当前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们，对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形成威胁。对历次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经济管理部门和经济学界都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并采取了很很多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是通货膨胀为什么还是屡治屡现，甚至程度有时更加严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分析和治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治标之类。当然在体制转换的过渡过程中对通货膨胀的治标和治本的措施都是必要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应该更多地分析出现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加大治本措施的力度，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1. 农业问题与通货膨胀

通过对1988年那次通货膨胀的因素分解分析，可以发现食品价格上涨是当时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食品价格上涨在当年零售价格上涨中所占的份额为50%。1994年的通货膨胀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更是粮食以及各类农副产品涨价幅度较高，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94年食品价格上涨在零售价格上涨中的份额上半年为57.3%，1—8月为60%，而8月份当月高达67.1%。引起1994年粮食以及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价格大幅度上调，粮价的上扬带动了整个食品类价格的急剧攀升；二是今年旱涝灾害比较多，影响了农副产品特别是蔬菜的有效供给，引起价格上涨；三是流通秩序不规范，国营商业主渠道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从而使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行为有机可乘。为什么粮食价格要不断上调？为什么自然灾害的发生会有如此严重的影响？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农业本身的问题。粮食等农产品在较长时期内呈结构性上扬的趋势是由我国资源特征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首先，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在世界早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资源的相对稀缺度决定了粮食等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涨是必然的。其次，我国正处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轨的过程中，以往农产品价格相对过低的状况必然要通过价格上涨加以改变。再次，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率较低，这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直接相关。如果技术进步率不足以补偿收益递减的影响，那么相对价格必然上扬。此外，目前我国农业基本仍处于分散经营状态，农业生产规模达不到明显降低成本的要求。然而，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农业的比较利益低的问题。但农副产品价格提高给农民带来的相对好处，很快就被工业品价格，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相继上涨所抵销，其结果甚至使农民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且这种“比价复归”的周期也越来越短。例如1993年农副产品收购价上升了13.4%，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

14.1%，“比价复归”的周期为零。

解决好农业问题是改革开放得以继续深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得以建立的根本保证之一。通过价格调整来解决农业问题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进行农副产品价格调整时，其所可能造成的对总的物价水平的成本推动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在调整农副产品价格时必须慎重，采取必要措施缓解调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应强调，农副产品价格的相对提高主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来实现。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的思想，同时，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为指导，探索出保护农业利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2. 投资规模与通货膨胀

投资规模膨胀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其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投资规模膨胀通过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双重作用循环交叉造成价格总水平的全面上升。通过分析 80 年代与 90 年代初我国投资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每当投资率超过 30%，在以后的一两年中必将引起高通货膨胀问题：第一次是 1986、1987、1988 年连续三年投资率超过 30%，引起了 1988、1989 年两年的高通货膨胀；第二次是 1992、1993、1994 年连续三年投资率超过 30%，已经引起了 1993、1994 年两年的高通货膨胀。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投资率	20.1	23.7	24.7	26.5	29.8	31.2	32.2	32.0	25.9	25.2	27.3	32.2	37.7	37.1
通货膨胀率	2.4	1.9	1.5	2.8	8.8	6.0	7.3	18.5	17.8	2.1	2.9	5.4	13.2	19.5

*：1994 年为预测数

1994 年 1-10 月，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40.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但这是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的继续高速增长，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54.1%。加上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有相当数量的流动资金被挪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还有些固定资产投资未列入统计，因此 1994 年的实际投资率将超过 40%。

投资规模膨胀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各级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职能转换的滞后。这种滞后不仅使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失效，而且破坏着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投资体制改革进程的迟缓无疑是引起通货膨胀问题的一颗定时炸弹。

3. 国有企业与通货膨胀

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各种利益障碍的存在，前一个阶段我们主要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方式来改革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但是这种改革推进方式使得企业的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依然只负盈不负亏。由于企业做为投资主体约束是软的，贷款可以不还，亏损可以不破产，因而他们在投资决策中往往忽视或大大低估风险因素，利率杠杆对他们几乎没有弹性。同时也很难找到某种经济手段来配置有限的资源，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来控制信贷和投资规模。过度依赖行政控制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易于振动，且振幅度较大的原因之一。

第二，部分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它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滞后。它们很难消化上游产品价格的提高，只能通过提价来转嫁压力。这不仅以成本推动方式造成了全社会总生活水平的上涨，而且以“比价复归”的形式大大减弱了价格调整的预期效果。此外，某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中存在着任意涨价的诱惑和冲动也会对通货膨胀形成影响。

第三，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效益不高，明亏、暗亏普遍，而国有企业亏

损的很大一部分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这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1993年国有企业明亏412.5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的10%左右，约为财政赤字的两倍多，为当年国内债务的60%左右。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是政府举债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国有企业暗亏每年数额有多大，尚无准确统计，但根据典型调查，暗亏比明亏至少多50%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往往掩盖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与国有企业的消费基金膨胀，以及行政费用难以控制的问题都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4.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与通货膨胀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可能造成地区发展政策与中央宏观政策的不一致。发展快的地区想要发展得更快，发展慢的地区想赶超上发展快的地区，因此，当发展速度与物价上涨发生矛盾时，各地区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速度去保全国的物价。一定的地区发展差异对全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沿海发展较快地区的高物价向全国的传播速度要远远快于资金、技术、人才向内地发展相对较慢地区扩散的速度。以南方相邻四省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为例，它们1992年GNP的增长率分别为22%、18.3%、9.2%和10.9%，但1993年它们的价格上涨却没有明显差别，分别为18.2%、18.9%、14.8%和18.9%。据统计，近两年全国生产、投资、消费增长的60%以上是由沿海地区带动的，而全国各地价格上涨水平的差距却小得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扩大未能把高速发展传递到每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却把通货膨胀压力传递到了全国。1994年1-10月的全国物价上涨所表现的特点之一就是，中西部地区的物价涨幅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在35个大中城市中，1994年1-10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率，广州为20.2%，深圳为18.1%，而郑州为27.1%，西安28.2%，乌鲁木齐为26.9%，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上涨率普遍高于22%。

实际上，投资规模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经常纠缠在一起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这些影响集中表现为以中央为代表的宏观管理与以地方和企业为代表的非宏观管理之间的矛盾。前者的宏观管理目标是实现总体的资源最有效的配置，而后者目标则是局部的利润（益）最大化。当我们的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时，由于行政分权和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分级管理体制结构中的中央政府的信息不完备，宏观与非宏观管理目标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形成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这种矛盾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各类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缓慢，经常出现的地方和企业倒逼银行增发货币的现象，以及长期存在的负利率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长期维持负利率的危害性。首先，负利率的存在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而且必将进而对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负利率的存在滋长了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妨碍了企业改革的积极推进；第三，负利率将助长投资规模的膨胀，不利于投资体制的改革；第四，负利率不仅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而且对居民心理产生预期恶化的影响，人为增加通货膨胀压力。此外，负利率的存在也为各种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条件。因此，以种种理由反对改变负利率状况的观点至少是短视的。

1993年通货膨胀问题比较突出，物价上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高峰年。在此基础上，1994年前两个月物价继续上涨，到3、4月，物价涨势略有减缓，但6月以后，涨势恢复趋猛，1-10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21.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3.7%，是历年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而且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是，农村物价涨幅迅猛，1994年1-10月消费价格指数，城市上涨24.4%，农村上涨22.2%；而从零售物价指数来看，从1994年4月起，农村零售物价上涨率开始连月超过城市，到1994年9月，当月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城市为22.9%，而农村

已达 26.6%，农村的物价上涨率已迫近城市而且大有超过之势，农村物价上涨成为全国物价水平持续居高不下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是，我们又不能将 1993—1994 年的物价上涨简单地与 1988—1989 年出现的那一次通货膨胀相类比，而应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首先，两次物价上涨的时序结构不同，1993—1994 年的这次表现为 1993 年生产资料涨价较猛，而 1994 年主要是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但生产资料价格基本保持平稳，有些甚至有所下降。这种时序结构方面的差异使得涨价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在不同时期能限制在一定影响范围之内。其次，两次物价上涨的成因不同。1988—1989 年那次是由于投资、消费双膨胀，总供给严重不足，出现抢购风潮，造成被动的物价上涨。而 1993 年仅有投资膨胀引起投资品价格上涨很猛，1994 年的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进行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而主动提高某些商品，特别是粮食的价格所波及影响的。此外，这两次物价上涨过程中居民的心理预期稳定程度也表现出显著的不同，现在居民保持心理稳定的成熟程度大大地提高了。然而，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对控制物价上涨所采取的不同调控措施和力度掌握，以及不同的调控结果。由于本次调控力度掌握得基本适当，因而出现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局面的可能性大大减小，而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1994 年我们处于远较 1988—1989 年有利的宏观环境中，通过各方面的努力，1995 年物价上涨率将会较 1994 年有较明显的下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确实比较严峻，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出现这次高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上还存在着难以在较短时期内彻底解决的种种问题：除了农业问题的影响之外，旧体制遗留的“大锅饭”体制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条件下，为了追求生产的高速增长，只能靠高投入，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投资规模大，但投入后的产出效率上不去，造成大量无效或低效投资。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理想，亏损严重。出了问题只能靠国家解决。国家被迫增发货币，加上金融银行体系尚不完善，货币供应量增长过猛，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到 1994 年第三季度末，流通中货币 M0 为 6412.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4%，狭义货币 M1 为 19009.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2.5%，货币供应量特别是货币供应量 M1 增长过多，必然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深层次原因造成通货膨胀的同时，一些非深层次的问题的出现又加剧了物价波动的幅度。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必须对此次通货膨胀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即，要分清物价上涨的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要分析连年高增长、高投资对物价上涨的滞后影响和非增长因素对物价上涨的影响；要分析居民的可承受范围和不可承受范围；要分析造成通货膨胀的表层原因和深层次原因，要采取治标治本相结合双管齐下的治理措施。在今后几年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显得尤为重要。

1994 年开始出台的外汇外贸改革、金融银行改革和财政税收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加强了我们的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的能力。然而这些改革毕竟还是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体制改革，因而还无法彻底解决在物质生产领域体制岗位存在的产生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所采取的许多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只能产生较理想的治标作用，而难根治通货膨胀的原因。另一方面，外汇外贸、金融银行、财政税收改革的成果又为我们及时地深入对物质生产领域内的体制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提出了 1995 年将开始重点实施企业改革，这是十分正确的方针。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及时地推进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才能摆正主要由体制问题引起的高通货膨胀的长期困扰，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四、1995 年经济发展趋势

1994 年在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1995 年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大力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程,加强宏观经济调控,谨慎操作的话,可以预期经济的“软着陆”将进一步取得成功。在现在的调控力度下,预计 1995 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平稳回落,GDP 增长率为 10%或略高一些,经济运行不致出现大起大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将进一步减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将基本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通货膨胀压力将有所缓和,但欲将物价涨幅控制在 10%以内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预计在 13%左右。同时,人民收入水平将继续有所提高,商品市场销售实际增长可望超过 1994 年,外贸形势进一步改善,有望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总的来说,1995 年总供求关系可基本保持平衡,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改善。这将为我们完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创造更为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1995 年取得经济发展较好结果的有利条件主要有:第一,自 1993 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进展顺利,力度适当,已经使宏观经济环境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物资保障、资金供给、存款余额、外汇储备形势都明显好于前一段时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都有不同程度的放松。第二,1994 年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已取了较积极的效果,1995 年将相继出台的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将进一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第三,国内市场在宏观调控下仍在平稳增长,潜力较大。第四,80 年代开始倾斜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逐步形成供给能力,并使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五,地方、企业要求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未减,热情依然很高,只要引导得当,是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重要保证之一。第六,国际环境变化中有利的因素进一步发展。以上因素都使我们在 1995 年实现较为理想的发展成为可能。

当然,我们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当严峻的,容不得丝毫盲目乐观和马虎大意,而必须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地去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经济在 1995 年存在着成功实现“软着陆”,使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并为本世纪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的可能性。但也存在着如果宏观调控不当而使宏观经济运行恶化的可能。

第一种危险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而且由于各方面压力的影响,宏观调控力度过早松动,投资再度出现膨胀,增长重新加速,使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趋紧。这种可能性虽使 1995 年经济增长率能再高一两个百分点,但将触发恶性通货膨胀,最终迫使宏观调控采取“硬着陆”措施,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有可能被迫放慢改革步伐,使改革和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1994 年 7、8 月份出现的速度和投资的再度加快,以及物价涨幅再度上升的现象说明这种危险的真实性。

第二种危险是一方面物价持续攀高,另一方面由于调控力度不当,或不注意调控方向的掌握,引起速度回落过猛,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人民收入水平下降,出现结构性“滞胀”问题。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将使 1995 年经济增长率跌落过猛,同时一方面由于供给能力的减弱,另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而必须采取扩大投资的措施,引起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矛盾的加剧,等于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今年出现的国有企业生产速度回落过猛的问题,以及通货膨胀结构中食品价格与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的走势严重背反的现象,都说明这种危险的真实性。

五、政策建议

1995 年我们应该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充分利用 1994 年一系列重大

改革措施出台取得的积极效果以及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有利形势，坚决积极稳妥地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解决好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从深层次上消除通货膨胀的成因。虽然我们在1995年有希望实现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大致均衡，但是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和10%以上的物价涨幅仍未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因此，我们在1995年的经济工作中应重点强调经济的增长质量、效益、结构等内容，以9%左右的增长速度、10%以下的物价上涨和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投资增长为调控目标，保证在1996年完全实现，为本世纪最后几年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为此，我们应该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1. 为了保证在1996年完全实现，并争取在1995年基本实现调控目标，在继续保持目前宏观调控方向的基础上，调控力度应适当加强，调控手段应适当增加，以防止因盲目追求产值和速度造成的投资膨胀再度死灰复燃，坚决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因此，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监测分析工作，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微调措施。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已出台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改革措施，使之能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有效工具的作用。

2. 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只能采取治标、治本兼顾结合的方针。而为了遏制急迫的高通货膨胀问题，可能短期内要以治标措施为主，例如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继续实行限价，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短缺产品适当增加进口平抑国内市场价格等措施。但是，我们在采取治标措施时，要注意不要因为仅为了治标而引起今后更复杂的治理通货膨胀问题。

3. 下一步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着重于物质生产领域内的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目前，已基本具备了积极推进这些改革的有利条件，而且，只有解决好这些方面的改革，我们才能最终取得抑制通货膨胀问题的主动权。当然，这些改革已经触动到传统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其难度是很大的。我们已经积累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完全有可能在大胆探索、积极实践、谨慎操作的基础上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当前迫切需要加紧进行的工作是《破产法》的完善和实施，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4.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争取实现经济“软着陆”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到战略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通货膨胀问题、投资规模问题、农业问题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很大成分上是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是不能完全由总量控制的方式解决的。况且结构问题中又包含着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各种因素。因此，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从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同时入手，不可偏废其一。

5. 重视财政预算赤字过大可能引起的问题。在处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这一对矛盾时，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采取较紧的金融控制和较松一些的财政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财政预算赤字过大可能引起的问题。1994年是实行新的财政预算制度的第一年，但表现为不含债务收入的财政赤字规模已经偏大，当年赤字规模已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8%左右。赤字规模过大将使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失效，大量发行国债将挤掉民间投资，并将资金转向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非债务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应基本保持平衡，以丰补欠，才能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

此外，财政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在复式预算制度方面。应该坚决执行经常性的税收收入只能主要用于经常性支出，国家财政投资应主要依靠发行国债等形式的集资和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生产性收入或积累部分来搞的原则，解决目前存在较普遍的将国家税收收入变象挪用或分流于投资，而科研、教育和公务员工资等本该由财政负担的经费又严重不足的

问题。

6. 注意利用利率杠杆进行宏观调控,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目前形势下,应注意用提高短期利率的办法来保证经济的稳步回落。当前,一方面通货膨胀率过高,另一方面又存在着通货膨胀将被抑制的中期趋势,因此,应缩小短期利率与中长期利率的差距。这样做不仅在此次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中使利率能够影响人们预期的信号而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能促进今后使利率起到真正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的作用,使利率成为防止通货膨胀真正的有效武器。

1994年11月2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必须把握的七个问题:一、必须坚决抑制通货膨胀;二、真正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三、以国有企业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四、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五、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七、加强改善宏观经济调控。这次会议为做好1995年的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在1995年的经济工作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目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统一部署,精心安排,扎扎实实做好1995年的各项经济工作;要有步骤、系统地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注意宏观调控的手段与力度,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本文执笔:汪同三、张昕竹、李军)

1994 年国家财政形势分析与 1995 年预测

1994 年,我国财政形势仍然处于困难境地。宏观经济中,由于投资增长、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和职工工资增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需求仍然相当旺盛,并且持续两年的高速增长已使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强化了“瓶颈”制约,使有效供给不足,因此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资金的供需矛盾相当突出,财政面临严峻的形势。年初预算安排,考虑了多方面的资金要求及组织收入、满足支出的现实可行性,把国家财政收入定为 4759.95 亿元,而支出定为 5429.14 亿元。这样,于连续多年出现赤字之后,又安排了 669.19 亿元的赤字。但是,赤字口径从这一年起采用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计算方法,不将债务收入计入财政收入,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也不包括在财政总支出之内,同时明确:收支差额全部通过债务弥补。因此这种收支差额不同于我国历年的那种“硬赤字”,属于所谓“软赤字”。为弥补预算收支差额举借的国内债务,加上当年外债和当年为归还国内债务本息而需发行的新债,使 1994 年的国家债务总额一跃而为创纪录的 1300 亿元左右。

至 1994 年 11 月底,我国财政收入完成预算计划数的 88.1%,比去年同期增加 19%;财政支出完成预算计划数的 81.4%,比去年同期增加 22%。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将比预算数超出 200 亿元以上,支出的超出幅度要更大一些,因此全年赤字也要比预算数大一些。总的说,就我国特定情况来评价,这一预算执行结果尚属大体正常,名义价格的收支绝对数的超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种通货膨胀之下的自然的、或必要的调整——估计 1994 年全年物价上涨幅度在 20% 左右,财政收支的超出,差不多刚刚抵销掉通货膨胀对其造成的贬值。

1994 年我国财政预算的执行,是在年初采取了重大的财税改革措施的背景之下展开的。为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推进改革,加快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以极大的决心,于 1 月 1 日开始实施财政、税收以及其它若干相关方面的配套改革方案。多年来想做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的“大动作”的财税改革,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次财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在财政体制方面,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即不再依照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依照不同的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本级财政收入,以求在稳定和规范中央、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同时,也淡化各级政府对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为企业真正走向市场经济的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与此相应,税制上也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流转税方面,于生产和流通领域普遍实行增值税;在所得税方面,实现了对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一视同仁;此外还调整、简并和新开征其它一些税种,进一步规范税章,严格控制减免,强化税收法治,从而在配合财政“分税制”改革的同时,贯彻实施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原则,以求正确而充分地发挥税收筹集政府收入、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当然,由于多种现实的制约因素,这次财税改革仍不得不采取“保既得利益”的渐进方式,带有相当浓厚的过渡色彩,也留有一些旧体制的尾巴,如企业所得税继续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仍按“基数法”而非比较客观的“因素法”;中央、地方的事权仍未清晰划定;“共享税”所占的比重还

比较高；等等。这些都属于起步之初难以一下子解决的问题，只能留待今后逐步予以解决。

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实际大动作的财税改革，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总的方案原则是各地方的基数有保证，企业的总体税负不变，但在开始阶段，特别是1994年第一季度，新财税体制的实行还是给企业、地方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发生了某些混乱现象。最为突出的，如有关增值税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和需要有所区别对待的问题，包括价内税变价外税的计算，专用发票的使用，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款抵扣，企业初期库存的税款抵扣，某些行业、企业实际税负的上升和原优惠待遇的丧失，等等；又如新体制下一些省份地方财源结构的剧变，收入先上交，后返还之间的时间差所造成的资金周转困难，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和财政部、税务总局有关部门，在1994年1—4月间先后下发了80多个文件，对新财税制度加以完善和微调，解决实际问题。以后，在中央、地方财力分配方面，也作出了其它一些调整安排，并在下半年于全国普遍实行了中央、地方两套税务机构的分设。

现在从全年的情况看来，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基本成功。这主要表现在：新体制的运行大体平稳，确立了在财政、税收方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税收收入不但没有滑坡，完成情况还是比较好的：1—11月税收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8.4%，预计全年不仅可完成年初预算数，还可望完成包括增收额的追加计划；同时，据新近税务总局、经贸委等单位的调查结果，税改之后我国企业的税负总水平没有上升，而且略有下降，达到了稳定税负的预定目标。当然，新体制在不少方面，特别是在中央、地方间财力分配的一系列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省级以下的“分税制”，还远未到位；税制中也还有种种不尽合理之处。因此，在肯定1994年财税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的同时，也要明确地认识到，这些成绩毕竟还只是阶段性的，今后需抓紧使之改进和完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

1994年，国债的发行任务达到了从未有过的超千亿元的规模，但发行情况之好出乎意料，超额完成了1020亿元的国库券发行指标。这对于财政预算计划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正常运转，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国债发行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居民认购国债的优惠措施，如两年期国库券“以旧换新”的优惠，三年期国库券可提前支取且分段计息的便利和优惠等；另一方面则与国家实施宏观经济紧缩措施之后的金融大环境有密切联系：股市的低迷，企业和民间集资热潮的回落，加上居民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的逐步提高，促使广大群众把注意力转回国债而积极踊跃认购。

基于前述情况的分析，如果要作一个概括的总结，可以说1994年的财政形势是困难之中有成绩，严峻之中有进展。一个最重要的转机，是当年新体制方案的出台，很有可能成为今后打开我国财政状况好转之门的重要前提。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我国财政困难的形成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综合国力不断加强，这有目共睹。然而经济发展了，为什么财政的日子却不好过，面临连年困难的局面？这里需要把问题放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管理体制模式转换时期的特定条件下来理解，认识财政困难的特殊原因。简言之，我国的旧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改革，而在改革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虽然经济增长已大大加快，但发展过程中由“粗放型”至“效益型”的转变尚难以到位，改革促使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效应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一点严重制约着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和克服财政困难的进度；同时，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矛盾冲突又要求财政投入大量财力来保持“安定团结”，维护大局的稳定，这种“压倒一切”的刚性支出往往进一步扩大收支的缺口，使困难表现得更为严重。因此，要实现财政状况的好转，根本出路还是以深化改革来克服种种提高效益的体制障碍，尽快使经

济增长由粗放转入集约，从而使财源充分涌流，最终达到财政随经济一道进入良性循环的境界。

展望 1995 年，我国宏观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着眼于控制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财政部已明确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将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同时预算安排要注重结构优化问题。

适度从紧，是为了从宏观调节上贯彻反通货膨胀方针，因而对财政收入要维持一定力度，对财政支出增幅要有约束；优化结构，即要通过收支安排体现对某些方面和某些产业、行业的政策倾斜，以缓解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基于上述要点，可以预计：

(1) 1995 年财政支出规模（当年价格）的增长率，在预算安排上不会高于 10%；

(2) 同时，当年财政收入在预算安排上的增长率，会争取略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以控制赤字规模；

(3) 鉴于 1995 年在帮助国有企业“卸包袱”，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支持农业发展等方面会有不少减收增支因素，所以赤字规模亦难以得到显著压缩，估计赤字绝对数不会低于 1994 年的水平，还很有可能略高一些；

(4) 1995 年弥补赤字的途径仍将依靠发行国债，同时由于前些年所发行的国库券的还本付息已进入高峰期，使当年偿债规模大幅上升，因此弥补赤字的借新债还旧债两方面的需要，必将迫使 1995 年内债发行规模再创新高。如加上外债，我国 1995 年的国债总规模可能要达到 1800 亿元左右，这将成为影响当年金融市场和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

(5) 为贯彻中央“一定要重视加强农业”的方针，1995 年财政支出中安排的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将比上一年预算安排数（210.63 亿元）有大幅度的提高；

(6) 为了加强重点建设，缓解国民经济中的瓶颈制约，1995 年财政支出将注重增加生产性基本建设支出，数额可能会比 1994 年预算安排的 457.56 亿元有明显上升；

(7) 为了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1995 年还将在财政支出中保持相当规模的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支出（这方面 1994 年预算安排的支出为 385.08 亿元）；

(8) 为了促进文、教、科、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提高劳动者素质，1995 年这方面的财政支出还将有适度的增长幅度，可能仍会高于各类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率（1994 年预算安排的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为 1132.96 亿元）；

(9) 行政管理费支出将成为 1995 年试图压缩的若干支出项目中的首选目标，但多年来曾屡次提出压缩行政经费而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行政机构臃肿膨胀，精简难度大，奢靡风气又滋长蔓延，同时也确实有办公现代化等增支因素，因此 1995 年要在压缩行政经费方面取得实效，必将面临艰巨任务；

(10) 鉴于 1994 年财税改革前曾大量出现地方越权减免税的问题，1994 年 1 月 1 日之后，严格控制了减免税，结果又出现欠税问题愈演愈烈的局面，欠税数额迅速上升，因此 1995 年将进一步强调以法治税，继续严格控制减免，并将采取强硬措施制止欠税数额扩大之势；

(11) 国有企业的亏损已连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要大幅度减少亏损看来有待一系列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方面的配套措施，无法一蹴而就，所以 1995 年将继续强调企业扭亏和减少亏损补贴问题，但财政安排的企业亏损补贴数额难以低于 1994 年预算的 166.34 亿元；

(12) 另外，为了追求使经济健康发展及财政状况好转的长远目标，1995 年国家有关方面将对上一年的“新财税体制继续加以改进和完善，一系列改革尚未到位的问题，如中央、地